反修

第九期

（2026年3月期）

工革报附属手册

反修

第九期

二革报编辑部

致广大读者同志、左翼组织同志们：

由于《反修周报》的制作主要由苍榆一人制作，无法保证质量与数量，由于其本身没有太多时间和能力，现决定，《反修周报》停刊！或将在以后的恰当时期复刊！反修周报自发布至今已有九期，感谢所有读者 同志的陪伴！反修周报问世到现在一直没有被很好的宣传，为了顾全大局，壮大力量，我们决定并入《工人革命报》成为其附属刊物，以“反修社”的名义发布，主要收录发表《工人革命报》的原创文章或发表的文章。主编仍旧为苍榆，刊物主要发布在电报频道！

反修社
二〇二四年八月五日

苍榆由于个人原因，将进行其他方面的编辑工作。因此，从《反修》第六期开始，编辑工作由赵润青接管。《反修》主要收录《工人革命报》刊登过的较好文章，并收录未在《工人革命报》上刊登的剩余投稿，以及其他来源的文章作品。反修社2024年8月5日工革报编辑部。

工革报编辑部
二〇二四年十二月十六日

在经过一段时间的重整之后，《反修》复刊，每期中收录工革报五篇中的好文章。由小夜半负责整理工作。

工革报编辑部
二〇二六年七月一日

目录

枉死卷王，出路何在？——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勤劳=悲惨 ······1

进博会上的电击手环刑具已登堂入室 ······5

我们研究历史的目的是什么 ······9

民主集中制 ······14

中学生组织的意义 ······19

枉死卷王，出路何在？
——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勤劳=悲惨

~~工农解放社~~

今年11月18日，广东潮州的一位工人因被爆裂的抛光轮击中头部而死，而工厂至今未向家属提供任何补偿。死者生前踏实勤劳，至少有19年的工龄了。为了养活家中七口人，每年只有过年才回一次家。

他虽然用个人勤劳换来了工人中最高工资，但是却血泊中，长时间无人发现，他的老父亲和未成年的子女依旧受着资本寒风的摧残。一天10多个小时的工作，一年365天的汗水，竟然换来如此悲惨的下场。

勤劳的牛马呵，为什么这么悲惨？

在这个社会里，资本家向工人罪恶地灌输着资本主义的按劳分配，就像资本家按资分配一样，谁投入到生产中的力气越多，谁便能得到越多的结果。好像资本家和工人一样在进行劳动，只不过资本家投入资本，而工人投入自己的血汗而已。

潮州的这位工人就是受到了资本主义的这种欺骗，才深陷在努力勤劳的深渊里，才让资本家一步步吸走了身上所有的血肉。

工资并非付给工人劳动的报酬，而是劳动力的价值的价格表现。劳动力价值相当于工人及其家庭必要的生活费用，其是由维持和繁衍劳动力的生活资料的价值所决定。老板在劳动市场购买了劳动力后，就把劳动力投入到了工厂的生产当中去，并在这个过程当中剥削工人的剩余价值，

实现资本增殖。

到了工厂以后，工人终于和劳动对象和劳动工具结合在一起了，在这里实现价值的转移和新价值的创造。在完成了对资本家预付劳动力价值的补偿之后（就是补偿了老板发的工资），资本家不会让工人就此停止，他一定会用皮鞭和饥饿，驱使着工人为他多付出一定时间的无偿劳动，不这样的话，资本家便是白忙活一场，分文也捞不到。工人劳动的时间越长，劳动的强度越大，资本家窃取的无偿劳动果实也就越多，工人的身心健康便损伤得越厉害。这也就意味着，只要付给工人的工资越少，而让工人做工的时间越多，资本家所赚的无偿劳动就越多，资本家也就越来越富了。

可是，不是干的时间越长，产出的劳动产品越多工资越多吗?

资本主义下的工资有两种形式，一种是计时工资，另一种是计件工资。计时工资是按照劳动时间长短来付工资。就按一天来算，法定时间一般是8小时，但是资本家有很多借口可以让工人工作10～15个小时，并且可以在这期间将流水线加快等方法，增强劳动强度。有些工厂还会按照小时来付工资，好像多干一小时就多赚一小时的钱。但是，小时工资的标准完全是资本家说了算，他会按一天的工资除以10～15小时得出小时工资。

这种小时工资对资本家更有利!

比如说需求量大的时候，就要求工人多加班，需求量小的时候就让工人提前下班。招之即来挥之即去。在资本家们看来，工人无非就是他们的玩物罢了。

计件工资是按照工人生产的产品件数或完成工作量付给的工资。看似是很公平嘛，但是资本家会按照最熟练工人的标准来要求每个工人所生产的产品质量和数量，这样也就把计件工资压到最低。等到所有的工人都熟练了以后，又会通过其他的方法压低工资。资本家可以通过产品质量

和生产时间这种冠冕堂皇的理由，任意克扣工人的工资。

资本家总是千方百计地剥削工人的剩余价值，因为对于他们来说，工人得到的工资越少，所生产的劳动产品越多，自己便越是能够得到更多的剩余价值。工人困苦并不是工人不勤劳，而是劳动果实全都到了资本家的手中。没有一个资本家是不依靠肮脏的剥削发家致富的！

所以我们可以简单的总结为一个公式，在资本主义社会里：

工人勤劳=资本家发财=工人贫困悲惨

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是两个利益根本对立的阶级！

从前是牛马，今天要做人！

有人说："哎呀呀，这也太吓人了，那工人就不能不去打工，不被老板剥削吗？"

资产阶级的无赖又拿出了"剥削有理"的陈词滥调。在资产阶级占有了生产资料的前提下，在生产资料属于私人的情况下，在劳动不具备相应的对象和资料的社会里，是绝对没有工人的自由的。毛主席说过："在阶级社会里只有具体的自由，没有抽象的自由。"有资本家剥削工人的自由，就没有工人反抗资本家的自由。列宁说："资本主义的社会劳动组织靠饥饿纪律来维持。"如果潮汕的这位工人不做工，等待他和他的家庭的就是饿死。而一般的工资已经不能够满足这位工人和他的家庭的最低需求了，所以他只能加班加点，拼劲全力地去努力赚钱。这也就是为什么，这位死去的工人拼命成"卷王"的原因；这也是为什么，一个爱干净的人能忍受黑工厂污浊泥泞的原因；这也是为什么，这个社会将许多正常的人变成痛苦的鬼的原因。

我们沉痛地悼念这位死去的工人，我们在他的身上看到了中国劳动人民

的善良和担当，他是中国工人在修正主义道路下受到压迫的代表，他的悲惨遭遇也是资本主义黑暗压迫所造成的必然结果。我们工人靠自己的双手创造了数不胜数的财富，但却被资产阶级抛进了社会的最底层去。无数的例子告诉工人们，在这吃人的社会里，勤劳不能带来幸福美满。只有捣碎这“百年魔怪舞翩跹”的社会，才能当家做主，才能成为真正的人！

进博会上的电击手环刑具已登堂入室

~~工农解放社~~

近期，上海进博会上上发布的一款电击手环引起了群众热议，厂家宣称这款手环通过“精准的电脉冲刺激”可以达到提神醒脑的效果，“一只手环抵过数杯咖啡”且毫无副作用。讽刺的是，厂商似乎深知其真实功能可能引发忌惮，于是掩耳盗铃地将它命名为“电子咖啡手环”。

面对这仿佛为自己量身定制的产品，加班的牛马们不禁冒出冷汗。哭笑不得的网友骂道：“要驴卖力拉磨，还何必搞啥‘电子咖啡手环’传的锥子都忘了吗？不如直接用老祖宗的‘传统浓茶探针。’”、“以为离缅北很远，结果公司就是园区。”

一款通过电击来实现功能的产品，群众首先关心的，自然是产品的安全性。中国石油大学副教授周广刚接受陕西科技报采访时称：“此类产品电流虽低于致死量，一般无生命危险，但长时间被电流刺激会产生热电效应，可能导致局部电烧伤。长期频繁接触微弱电流，可能会改变人体正常电位差，影响心肌电生理过程，或导致头晕呕吐。”

然而，比直接电击危害更大的，在于它的功能本身。通过电击手段强行提神，使劳动者过量劳动，会对人体造成更大的伤害。人的劳动力是有限的，过度劳动就是在透支工人的生命力，让他们快速衰老，早早死去。只是这种不易察觉的伤害能给资本家带来利益，也就被喉舌们刻意掩过了。

人体是一项经过数亿年自然选择优化而来的高度精密的生物系统，其每一项生理特性的存在都是为了服务于生命的存续。“疲劳”与“困倦”

并非身体的缺陷，而是防止身体损伤的主动保护机制。当人在劳动时，会消耗生命燃料（ATP等），产生代谢废物（腺苷等），而当代谢废物积累到一定浓度时，人体控制疲劳的系统（HPA轴）就会触发疲劳感，强行降低神经驱动力，抑制高强度劳动，阻止细胞不可逆损伤。这就是长期重度劳动的工人，要比与他相同岁数坐办公室的领导看上去老得多的原因。

由此可见，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尽管自称电子咖啡，实质不过是园区电棍。这款产品的发明目的，丝毫不是为了帮助工人摆脱疲倦，而是帮助老板榨取工人更多的劳动。“电子咖啡手环”做的只有一件事：用外加电流强行抑制腺苷信号，关闭这一保护机制，让劳动者在生理警报已拉响的情况下继续透支生命，以供机器运转吞噬，通过超量的劳动把工人的剩余寿命直接折算成当月利润。其唯一的进步在于：过去需要可恶的监工拿着电棍，而现在这些监工都失业了。资本家对利润取之尽锱铢，源于对劳动者生命的用之如泥沙。

“资本害怕没有利润或利润太少，就像自然界害怕真空一样。”他们为获取更多利润，丝毫不顾忌将摧残劳动者身体的刑具正常化滥用。电击手环登堂入室，正印证了《资本论》中的这句话：“一旦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胆大起来。如果有10%的利润，它就保证到处被使用；有20%的利润，它就活跃起来；有50%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为了100%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300%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的危险。”一条小小的电击手环，就能让枯竭的工人强行打起精神，“正常”地在岗位上多闪耀几个小时奋斗光辉，而除了工人手臂上的烧伤，和因劳力过度受损而早几年到达的死期（也有可能是早几十年。就在几天前，一位21岁的青年工人因过劳而猝死），资本家们会损失什么呢？如此利国利民的好物，又怎能不被摆上展台？

这时，蒙冤的人民企业家要跳起来喊了：“工人提高劳动效率，企业多赚钱，工人涨工资，这对企业与工人都有利！”可事实真的是这样吗？提升劳动效率对工人到底没有好处呢？我们说：丝毫没有！

工资的基本形式有计件工资和计时工资两种。

在实行计时工资时，一小时劳动报酬是衡量劳动力价值或价格的单位。提高劳动强度事实上就是降低劳动力一小时价格，因为这时消耗的精力较多，等于工作日延长，但是报酬依然和从前一样。由于一小时的价格降低，工人为生存，不得不更紧张地劳动，或同意进一步延长工作日。劳动的过分强化，就和工作日的延长一样，会增加劳动力的支出，使得劳动力受到损害。一小时的报酬越低，工人就需要愈多的劳动或越长的工作日，才能得到足够维生的微薄报酬。另一方面，工作时间的延长又会让一小时劳动报酬进一步降低。资本家就利用这一点来为自己牟利。

在实行计件工资时，生产产品的单价是衡量劳动力价值的单位。资本家在规定单价时：第一、考虑到工人一天的计时工资；第二、考虑到工人一天内制造的产品数量，且通常以工人的最高产量为标准。比如某部门在实行计时工资时工人平均日工资为200元，产出产品为20件，则计件工资单价为10元。但这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资本主义的计件工资制度会使得劳动强度不断地提高，劳动的紧张程度是由工人获取必要生活资料所必须制造的产品数量和质量决定的。为了养家糊口，工人不得不一天制造更多的件数，不得不更紧张地劳动。但只要一定数量工人劳动强度达到更高水平时，资本家就会降低单价，工人就为了保持他的原有工资总数（生活水平），不得不再次延长工作时间或提高劳动强度。结果就是：劳动强度提高了，但工资并不增加，工作日并不缩短。工人的血肉精气被机器高效且过度地消耗。于是工人迅速衰萎，变成残废，被当作废物从企业中开除出去，沦入失业队伍。

有时资本家为欺骗工人，也会在增强劳动强度的同时吝啬地增加工资，造成多劳多得的假象，但白骨精如何变化模样，其本质都是一具骷髅。资本家实行各种工资制度的诡计，也都为了一个目的：在尽量提高劳动强度的基础上从工人身上榨取最多剩余价值。（如消耗两倍劳力，发放相当于三成工资的奖金）因此，劳动强度越高，工人的工资相比他消耗的劳力，就降低得越多。

由此可见，工人提高劳动强度，只会损害他们自己的利益，而要破除此害，需要工人们团结成一个阶级，为争取提高工资而做斗争。

工资的最高界限是劳动力的价值，最低界限则取决于纯生理限制，工资具体在区间中的位置，则是由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间的阶级力量的对比决定的。今日，电子咖啡手环作为突破生理极限榨取利润的法宝搬上了展台，正反映出中国工人阶级斗争力量的弱小，以及国内工人工资已被压低至极限的现实。

列宁指出：改良是阶级斗争的副产品。

没有通过科学理论武装组织起来的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在各个领域进行斗争，使阶级力量对比一边倒的现状发生改变之前，资本家绝不会因为良心或舆论压力而收手，而只会得寸进尺，一步步收紧套在工人脖颈上的绳索。今天他们能把电击项圈包装成电子咖啡卖给我们，明天就会把更高效的刑具摆上展台。这是因为资本家坏吗？不，他们只是资本的人格化。只要社会继续按照资本主义的剧本演出，电击项圈就会永远贴心地为我们升级换代。

如今，饥渴的资产阶级为榨取每一丝剩余价值，已将黑手伸入工人维系存活的脑髓肌丝之中。这种疯狂，恰恰印证资本主义已走到穷途末路，资产阶级的统治即将无法照常维持。下一场革命高潮，仿佛天际线上的桅杆，已隐约可见。今天，我们左派首要的任务，就是坚决而切实地深入工人之中，将革命理论与工人运动相结合。这是推动中国革命迈上新阶段的关键——打破坚冰，航道自会开辟。

我们研究历史的目的是什么

秋狐

关于研究历史的目的，唐太宗道："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由此可知，李世民研究历史的目的是了解前代兴衰的原因，吸取教训然后施政从而避免唐朝灭亡。不少人读史也是秉持着"以史为鉴"的态度的，看来这就是学史的目的。黑格尔将这些概括为"道德的反省"或"道德的教训"，并且"人们常常修订历史正是为了获得这些东西"。

可对此，黑格尔又说："经验和历史所得出的教训是，诸民族和政府从来没有从历史中学会什么，也从来没有依照已经从历史中得出的教导而行动。"

个人往往可以在历史中学到些教训，但只要将视野拉开，从一个朝代，一个民族，乃至全人类看来，人们在历史中仿佛什么也没有学到。史家与士大夫们认为：皇帝做好了勤政、礼贤下士等分内之事，则天下兴。但暴政与灾难却依旧发生，饿殍遍野、易子相食的事情在史书中可谓是常客，文明跳不出所谓的历史周期律。众所周知，打仗很不好，会生灵涂炭，会给国家带来巨大的财政压力，对于国内的哪个阶级都不是一个好消息，可至今战争仍在继续（尤其是在战争平凡的地带，他们所收获的教训应该是不少的，例如中东）。人们对此感到失望，或者，准确地说，是对人性感到失望。在这个意义上，史学毫无意义，人类的前景也是一片灰暗。

但奇怪的是，人类文明在不汲取教训的情况下却仍然在进步。君主制被推翻后，连同那些治国经验也一同被抛进了垃圾桶里（因为它已经没有了用武之地）；新的国家制度与国家元首有着新的方法来治理新的国家。

或者说，人类本就不需要这些历史教训?

“每一个时代都有它自己特殊的状况，每一个时代的状况都是如此独一无二，以至于它必须在它自己的时代从它自身出发作出决断，而且只能如此做出决断。”黑格尔所言极是。每个历史阶段都具有自身的特殊状况和以其相对应的任务，前一个时代的教训几乎教育不了后一个时代的人，并不是因为人们不听话，而是它没有用。资产阶级不能以地主阶级的历史经验来统治社会，无产阶级也不能以农民阶级的历史经验来进行革命。

时代的更替不仅是对上一个阶段的否定，也是对以往一切历史经验的否定。时代的矛盾无法通过任何历史经验所习来的方法调和，只能任其发展。由此，一个时代灭亡了，一个时代开始了。

而且不难发现，哪怕在同一时代（就以中国古代举例）都会出现两种情况：重要人物不听从历史教训和历史教训仿佛并没有交给重要人物解决问题的方法。

前一种情况许多史家会完全归为该人物（主要是君主）的主观问题，但细细究来会发现他的主观问题是在现实生活中培养出的（一些精神病或弱智的例外我们暂且不提），“生活决定意识”，也就是说根本问题扎根于社会现实中。例如宦官专权（君主重用太监）的问题，史家将它归为王朝灭亡的一个因素，并多次强调了这个问题，可是每个朝代总是能见到几个权力大的太监。因为在专制王权之下这种情况是不可避免的，皇帝为了做到君主专制，不可避免地需要用一些亲近的、信得过的人来掌握政局，女人不能从政，那么要么是身边的太监，要么是近亲的臣子（不作为皇权争夺者的兄弟也同样）。宦官专权就是专制王权的附加品（不仅仅是宦官，古代那些权臣也道理同样）。后一种情况在中国古代，史家一般归为一些因素：天灾、乱臣贼子兴起、君臣能力不行、前任皇帝遗留问题等，但究竟哪个才是主要的他们也没弄清楚，连问题都弄不明白又何来的经验教训呢？当然，他们弄不明白问题的根本，找不到主要矛盾在于其阶级局限。他们认为可以存在一个永存的王朝，从而自己作为

地主阶级的利益也得以永存；他们不是要发展历史，而是要停滞历史（克己复礼）。但除了物质本身，有什么是可以永存的吗？他们并不是没看见阶级斗争，《商君书》中就提出了“民弱国强；国强民弱”的主张，却不知引发这一切斗争的原因和这个动力的强大之处。地球并未停转，历史始终向前。人们总要先满足自己的物质生活，进行着整个社会的生产与再生产，从而推动着阶级斗争的发展。作为历史合力的发展，个人意志是没有办法抵抗的。

为了维护反动统治的“以史为鉴”终究是被否定了。

那么，我们研究历史的目的究竟是什么?

有人提出，研究历史本身没有目的的，只是人类偶然发生的一门学科。可是，这种偶然性的依据又是从何而来的呢？我们若是把历史学当作一门（社会）科学对待，便又“把科学看做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若是这门科学对于人类现实没有意义，那么人类为何要去研究它？或者说是什么在支持人们去研究它（历史学毕竟是一门科学，它不好玩）？他们无法准确回答，只能虚伪地用一些“文化价值”之类的马虎眼糊弄过去。唯心主义的哲学家们则是硬气地宣布是精神使然，但当唯心主义大厦瓦解之时，这个原因又是什么呢?

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史学研究总是要服务于当前的社会现实需要，对其有用才拥有存在的意义。那么什么叫“有用”呢？主要就是指它发挥出了作为上层建筑的作用，服务于将它创造出的那个经济制度，服务于在这个经济制度下的统治阶级，维护那个阶级的发展或统治。从中国古代的历史中就可看出，地主阶级研究历史的目的正如司马光所言：“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过去的一切史学，都是在想方设法地从观念与现实中保存私有制，到了现代的资产阶级的史学研究的目的就在于论证与保障资本主义的必然性与永恒性。

那么无产阶级研究历史的目的也一样吗?

每一个无产者或许研究历史的目的不同，有人出于爱好，有人出于工作。但请注意，我们此处说的是“无产阶级”。阶级是人们在生产中因为那种特殊的生产关系而形成的一个劳动群体，因而它（的行为）代表着一定生产关系的矛盾一方面或代表着一定的生产关系本身。所以，一个阶级产生的一切意识形态也好，创造的一切上层建筑也罢，都代表着生产该阶级的生产关系的矛盾的一方面，也都服务于那个阶级，服务于那一方面（对于剥削阶级而言，服务即保存该生产关系；对于被剥削阶级而言，服务即消灭该生产关系）。

无产阶级的史学研究同样服务于它那个阶级——现代无产阶级。它一方面是建立在资本主义制度之下的（或者是处于资产阶级专政国家之中，总是是身处于当前这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极大优势的人类社会之中），另一方面是建立在社会主义制度之下的（潜在的或现实的）。在这样的一种社会现实中，史学研究作为一种上层建筑是要对经济基础发生积极作用的。而这个作用发生的方式取决于无产阶级如何去研究历史，用什么手段研究历史？答案是显而易见的，那就是历史唯物主义。

历史唯物主义是无产阶级研究历史的根本工具，它是完全依据社会现实而展开辩证法则的科学。而“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因此，无产阶级研究历史的目的绝不是要在观念中或现实中妄想留住某个时代，相反，他通过对现有材料的研究发现了一切历史与现存制度灭亡的必然性与社会历史演变的逻辑。他看见一切社会性的存在本身就是自我矛盾，不断地进行自我否定，直到灭亡；旧的时代灭亡了，新的时代来临了。以往的史学告诉人们，有一种社会形态是可以永存的；历史唯物主义告诉人们，没有什么社会形态是可以永存的。

但是无产阶级并不是简单地否定了前一个时代，重要的是在现存的一切历史中寻找到历史演变的逻辑，从上一个时代的材料中找到下一个时代的要素，所谓不破不立。新的社会形态并不是空中楼阁，而是建立在否定前一个时代的基础上，它的胚芽孕育于前一个时代之中。

现代无产阶级研究历史的首要目的就在于：

一、在历史中学习革命的辩证法，认识到资本主义制度以及整个私有制度的必然灭亡，以及认识本国资本主义灭亡的特殊条件，因而找到适合本国无产阶级革命的道路，从而推动本国无产阶级革命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

二、认识到社会主义国家在建设过程中遇到的重大问题，例如改变生产方式的问题，对待本国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以及农民的问题、防止修正主义复辟的问题等。认识这些问题的目的是解决这些问题，建设一个更好的社会主义社会。当然，同历史上的反动阶级不同，无产阶级解决社会主义中存在的问题并不是为了延长社会主义的寿命，相反，他是要更快地完结整个社会主义的历史，使得整个人类历史演进到共产主义的社会中去。

一句话，革命和共产主义就是无产阶级研究历史的首要目的。

民主集中制

齐杭

民主集中制是无产阶级的根本组织原则，它于党而言，是党的工业化方式的支撑柱。

民主集中制不是只民主不集中或者只集中不民主，也不是简单的少数服从多数或者多数服从少数；而是民主与集中二者对立统一，并根据具体情况的变化来调整民主与集中之间的辩证关系。

一方面，民主是必要的，但不是绝对的。

现在很多泛左翼组织谈到民主总是用诸如“群众的眼光是雪亮的”此类话语为自己无条件无原则的大搞民主进行辩护，几乎是把民主集中变成“议会民主”。他们为了民主而民主，坚决不把机会主义、修正主义清除出去，说只要搞集中领导就是搞独裁，拿着四大民主宣称要保护所有组织成员的充分的“民主”权力，嘴里说着“左派大联合”、“团结一切可团结的力量”，但是组织内部出现了什么错误思潮也毫不作为，搞得跟意识形态大杂烩一样，这就使得他们对于任何活动都难以达成统一的见解，无法迈开腿脚走向革命实践，苦苦陷于泥潭之中。所以不看成员的思想条件、是否具备一定的革命修养就胡乱实行所谓的“民主”，实质上是在犯“极端民主化”的错误，是在推行小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政策，结果只能是削弱组织的党性、扩大非党性。

如果组织成员都具有一定的革命修养，都基本站在了正确的路线上，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实行“民主”、搞批评自由，是完全有利于解决各种细枝末节的问题以及捍卫正确路线的。

在解放战争期间，毛主席与粟裕在军事战略计划上存在分歧。毛主席认为当时的解放军要“分兵渡江南进”，而粟裕则认为要“集中兵力在中原打大歼灭战”，在经过一番商讨后毛主席实行了粟裕的计划，结果就是快速推进了解放战争进程。可见，在坚持正确路线的前提下实行民主，有利于集中更多地正确意见，推动革命工作的发展。

对于我们革命者而言，民主从来都是给革命的，专政从来都是给反革命的。所以，我们要实行民主，但是在坚持正确路线的原则下实行，离开正确路线实行民主实质上就是在帮错误思想的忙，是在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另一方面，集中领导不论是在拥有政治自由的资产阶级民主专政下，还是在没有政治自由的资产阶级法西斯专政下，再或是到了无产阶级专政时代，它从来都是无产阶级政党和组织的制胜法宝。

在今天，这个中修社会帝国主义反动政府大肆实行资产阶级法西斯专政的时代，革命工作是以分工的形式进行的，各方面的革命工作需要具备各种才能的人，抛去核心的领导集团，负责一部分工作的人只负责他们负责的这一部分工作。这种工作形式能够尽可能发挥革命组织的力量，并且实行这种严格的分工可以有效的保证斗争的秘密地下性，使得组织的损失不会以点成面的扩大。但同时也就更加要求有一个能够详细了解各处工作，进行统筹规划的领导核心。

所以，当前革命组织所实行的集中制，应该主要就表现在报告制和委任制上。

一方面，委任制可以保证在地下斗争时期的秘密地下性，这就完全没有必要将所有的事情全都民主决定，并且不应该让一些繁杂琐事阻碍组织的运转效率。另一方面委任制如果运用的好的话，那么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及时纠正在先锋队组织过程中的思想和路线问题，可以说委任制在先锋队早期的组织工作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但是委任制是一把双刃剑。如果实行的不好，就会帮助“奸臣当道”，影响组织的工作开展；如果实行的好，就会保证组织的各部门、各地方组织都可以在一条正确的思想政治路线下开展工作，推动组织的工作开展。

另一方面，通过实行报告制，中央可以根据各地方组织上交来的报告，判断其领导者在各方面的情况如何，以及其余成员在各方面的情况如何，以此来决定是否委任其他有能力的成员来担任该地方组织的领导职务。同时，对于一些紧迫的重大问题，如果该地方组织的领导者加以隐瞒，或是有其他情况不能及时向中央请示，那么其中的组织成员可以通过各种方式（例如线上通过邮箱向中央传达信息，线下通过代办员网向中央传达信息等等）向中央说明情况，使中央可以第一时间做出反应，并在之后考虑能否选择更适合的成员担任领导职务。

不过，一方面为了保证报告制和委任制可以尽可能正确的实行下去，并且不使其造成只集中不民主的情况；另一方面又兼顾到在当前的专制环境下，组织所实行的民主集中制中集中的成分要占据的多一些，所以我们虽不实行选举制等民主制度，但也会保留各个成员在不违背纲领精神下的批评自由的权利。

因此，在中修社会帝国主义大肆进行资产阶级专政的今天，民主集中制中的集中成分一定要大于民主。

东风过分要求民主，他们要求的在组织内实行最广泛且公开的民主在现在不仅无益，而且有害。从主观层面来讲，在革命纪律无法得到贯彻与巩固、不能保障每一个革命者都有着较好的革命修养的今天，全体成员一人一票选出一个代表，然后代表接着一人一票往上选的民主，完全不能保证整个组织始终都走在正确路线上，这样的选举实际上是只民主不集中，拜倒在自发性下了。由于客观上中修的专制和主观上的大部分同志还能力不足，因此选举制根本不能做到“使党的各级委员会真正代表无产阶级利益，把那些群众工作能力强、作风民主的党员选为代表或选进领导集体”，倒是很有可能把那些错误路线的领导者选进领导集体。

东风在谈到委任制的时候讲到委任制不能代替集体领导，这点不错，可是委任制并不是只有在万分紧急的时候才会使用的，比如当某一个方面的工作中掌握正确工作方法的人占少数时就可以使用，避免无休止的争吵、用事实说话。

所以很显然，东风派并不懂得要根据具体实际情况对民主和集中之间的辩证关系进行调整。他们在谈到燎原派认为“民主高于运动形势就是小资产者的机会主义，民主低于运动形势就是资产阶级的官僚主义”的时候竟然认为这是胡话，可我们倒是觉得这是燎原派关于组织建设的理论问题中为数不多的真理了。

与东风相反，燎原派则是在实践上过分的强调了集中（委任制），燎原派的机会主义者一方面认为只要提出对组织的批评亦或提出异议就是不遵守组织纪律，就是组织的敌人，凡是盲目服从他们的他们都重用，委任制为借口确立自己的权威。这种官僚主义、宗派主义行径完全的破坏了民主集中制的原则，是组织纪律变成了机械纪律，使得下级盲目服从上级，大搞一言堂。另一方面，由于燎原派在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有着严重的错误，因此任何在思想上有悖于他们观点的人——无论正确与否，都将被实现所谓的“专政”，这也就直接造成燎原派的错误路线和观点至今都没有得到修正，而且这株毒草还不断地生根发芽，迷惑着更多的同志。像他们这样过于强调集中、沉迷于委任制，不仅不是在实行民主集中制，反而是在破坏民主集中制。

我们已经说明，民主和集中二者对立统一，缺一不可。为了避免燎原的这种情况，我们还应该谈谈民主集中制的民主方面。

派从燎原派那里我们可以看出，虽然在现在的条件下集中是大于民主的，但集中方面过大同样要出现问题，组织将时刻面临着可能出现因个别领导同志发生思想路线的问题而扩大错误以及官僚主义的问题。要注意组织内部时刻存在两条路线的斗争，机会主义、修正主义就在组织内部，因此必须把集中建立在民主的基础上，从这一层面来说，“没有高度的民主，就没有高度的集中”。不能把组织的一切决定都看作是少数

人的事情，下面人执行就好了，要根据具体情况尽量使一些重大问题让整个组织参与进来进行广泛的讨论，中央的重大决定要让整个组织所有成员都有进行批评和监督的权利。少数人要服从多数人，但是多数人要保护少数人批评和监督的权利，全体成员要服从中央，但是中央要接受全体成员的批评和监督，下级有权根据纲领的精神进行讨论、批评和监督甚至在紧急的情况下用非常规手段更改上级作出的决定和行为，要在组织内部允许并鼓励在不违反纲领精神下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听取其中正确的意见和批评并进行检讨、采纳。只有在不同的情况下依据所有的条件充分保障民主权利，才能发挥组织的强大力量，锻炼组织的纪律性、严密性，保障组织走在正确的思想政治路线上。

综上所述，我们为了建党固然要时刻强调民主集中制，但是又要根据实际情况的不断变化来调整民主与集中的成分。

在当前中国存在着强大的专制制度，而反动的修正主义集团正以全力打击革命者的情况下，很显然我们只能坚持以集中制为主的民主集中制。以为可以不要民主集中制，就是想在根本上摧毁一个革命组织；以为可以单方面的坚持“集中制”就是在走官僚主义行径；以为可以单方面的坚持“民主制”就是在走自由主义行径。

中学生组织的意义

佚名

在建设地方组织的视角下审视，中学生组织与大学生组织应该保持输送人才，相互支持的关系。在过去的工作当中，中学生与大学生组织之间的关系往往模糊且不明确，两者之间缺乏实际的联系，而只是靠着某地某学校的人际关系勉强维持。可以说，其实在全国范围内都缺少中学生组织与大学生组织的正确联系，建立起来的中学-大学联合组织太少了。我们的地方运动当中，更是在以年为单位的时间范围内，都没有看到这种联系，甚至是这种联系的可能性都很少。

全国范围内，两者都不少，甚至多个组织同时存在于一个地区的可能性也很大，对于总体的革命目标来说，无疑是一笔相当重大的财富。但是这笔财富至今没有得到合理的运用。中学生组织并没有合理的将自己与全国运动建立足够的联系，而只是首先自我定位为单纯的讨论团体与学习团体。大学生团体，因为中国大学本身的资产阶级堡垒化与脱离社会现实的倾向，往往也不能走出自己的校园，与城市内存在的其他中学生组织建立联系。而两者分别都对中国革命的核心力量——工人阶级与其运动没有什么了解，或者是以一种扭曲的，特有的被小资产阶级革命倾向影响的方式“自以为”参与了进去（这一点我们后面会谈到）。

那么，我们站在这样“路线抉择的十字路口”面前，进行这样“最紧要的斗争”便是中学生和大学生的联合组织最主要的任务了。为了推进我们的学生工作，将中学和大学打造成联合起来的培养革命家的坚固阵地，只能改善我们上面提到的情况，得先从改变我们的认识开始。我们有必要进行一个理论的检视，首先要从列宁开始。

列宁对中学生组织的定位

列宁对中学生组织的定位这一话题下，最著名也是最重要的一份文本，莫过于刊登于《火星报》1902年12月总第29号上的《致中学生》。鉴于这是一篇小但精华的文本，我们全文摘录如下：

“我们衷心祝贺学生们坚毅的创举的同时，要向学生们提出同志式的忠告。希望你们努力把自我教育、培养自己成为坚定刚毅和坚忍不拔的社会民主党人作为自己组织的主要目的。把这项极端重要和必不可少的准备工作同直接的实际工作尽量严格地区分开来。希望你们在加入作战大军的行列时（和加入以前），竭力同地方的或全俄的社会民主党组织建立最密切的（和最秘密的）联系，这样你们就不致在着手工作时孤立无援，你们就不必从头做起，而只需继续从前做过的事情，使你们能够立刻各就各位，把运动向前推进，把它提到更高的阶段。

从文本中，我们能提取出列宁对南俄中学生组织的三个主要指示：

一、中学生组织的目的是培养“坚定刚毅与坚韧不拔的”党人；

二、实际的组织工作要与这项培训工作分开；

三、要向党的地方和全俄组织靠拢。

但是这还不够。列宁的指示当中有着相当重要的一个条件，就是自我培养的工作要与“实际工作”严格的区分开来。那么，这里的实际工作指的是什么呢？是什么样的实际组织工作要与极端重要的培养工作相分离呢？这两项工作之间的关系搞不清楚，就无法领会列宁关于中学生组织建设的全部思想。为了探索这里的“实际工作”到底指什么，我们就要后退一步，从南俄中学生组织向《火星报》投稿的声明说开去。这份声明尚未被以任何形式公开翻译为中文，因此我们只能查阅《火星报》第29号的档案并翻译。查阅档案的辛苦完全是与收获成正比的，因为这份传单当中的内容，恰恰补全了极端重要的缺少了的部分。我们摘抄其中的重要内容：

“代表大会承认，我们的中学无法满足渴望知识的青年的最起码要求……代表大会承

认，只有靠自己的力量，青年学生才能获得学校本应给予他们的东西。

代表大会认为，我们中学反常状况的根本原因，在于专制俄国的社会政治制度……代表大会认为，如果不改变俄国整个社会政治制度，就不可能对中学进行根本性的改革。

鉴于知识分子的使命是为人民服务，代表大会认为必须为此让青年学生做好准备。代表大会承认，俄国知识分子的迫切任务，是在俄国人民的劳动阶级中传播社会主义原则。

代表大会承认，青年的力量不仅在于觉悟，还在于团结。鉴于目前建立全俄中学生组织的构想尚无法实现，代表大会认为必须建立一个所有南俄中学的统一组织……与其他地区的中学生组织建立同志式的联系。

代表大会认为必须出版一份致力于研究学生青年的需求和利益的刊物。”

至此，我们才能还原列宁指示的全貌，即中学生组织的实际工作到底应该是什么。从上面摘选的决议当中，我们能发现南俄组织为自己设定的五个任务和其意义：

第一个任务，建立替代性的教育体制，通过党的无产阶级的教育为青年学生提供专制政权下的教育体制所不能提供的知识、科学、斗争经验（在阶级社会当中无产阶级青年武装自己的极端重要的武器）与本阶级的阶级意识；第二个任务，努力推翻俄国的专制政权与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作为无产阶级革命的纲领与目标，中学生要将自己培养成为坚韧不拔的社会主义者，就必然要接受无产阶级革命的纲领与任务，并将其作党的纲领与无产阶级斗争的知识传播到社会当中。青年学生要为参与这一项重要的任务积极的做好准备。这样，我们就又回到了“准备工作”与“实际工作”的关系问题。能够完成以上所有任务，让个人的意识与党的建立推向前进的唯一载体只能是以“同志间的关系”结成的组织。因此，建立这样的组织就成为了最重要的“实际工作”，而学习如何建立这样组织的知识就成为了最重要的“准备工作”。在这样的组织当中，实际工作与准备工作交织在一起，却又分开；交织是因为没有准备工作就不可能进行实际工作，而不进行实际工作也不可能完成准备工作；之所以要严格的区分开来，是因为实际工作的极端重要性，无法使其完全“服务于”所谓的准备工作即“培养人”的工作，而是应当作为党的任

务与组织行动的基本原则被正式的提出来，将组织建设成能进行最严格的地下工作与最广泛的地上工作（以完成我们的第二、三个任务）的战斗组织。

第五个任务，即政治报的任务，就是我们这个地方现在在从事的事业。通过编篡一份这样的政治报，我们能够使得本地的运动在一定的共识和原则的基础上形成一个在地的联络总站与行动核心。

不管是政治报模式还是其他的组织生活，只要同时进行“对立统一”的这两项工作，就能保证形成的核心能够具有我们追求的那种党性。到那时，我们才有可能谈到将地方的学生组织打造成地方组织，将地方组织打造成党小组。到那时，我们的队伍当中才有可能有这样一批坚定刚毅和坚忍不拔的党人。

因此，得出列宁主义中学生组织的两个定理：第一、中学生组织一定要是政治化的，并且将培养党人（为各条战线服务的革命家）作为主要力量，并且一定在根本意义上将自己的活动视为政党活动的一部分；第二、中学生组织一定要是与实质建党的进程结合在一起的，首先目标是将自己视作地区内的政党建设者，与工人运动紧密的结合在一起，不能限制视野，不能仅仅定位自己是中学生。因此，我们要建设的中学生组织是“政治化的战斗组织，政党化的预备组织”。

这意味着，组织内部的一切活动——无论是理论学习、社会调研还是宣传鼓动——都不能仅仅停留在知识分子的自我满足或校园改良的层面，而必须在根本意义上上升到党性培育的高度。我们的目标不仅仅是培养拥有马克思主义知识的学生，而是要生产“党人”，即生产能够适应未来残酷阶级斗争、具有全国运动的全局视野，能够服务于各条战线的职业革命家。因此，组织每一位成员都应当意识到，自己参与的不是课余活动，是在接受成为无产阶级先锋队的预备训练。组织应当成为一座熔炉，通过政治生活锻造出在思想上、组织上布尔什维克化的骨干力量。只有将组织活动视为政党活动的一部分，我们才能赋予学生运动以持久的生命力，使其不因人员的流动而中断，而是源源不断地为革命事业输

送新鲜血液。

至此，我们就明晰了列宁主义原则当中中学生组织的定位问题。现在我们有必要做一个历史的复习，看看在历史上列宁主义者是怎么走这条道路的。

世运史上中学生组织——中国运动史上的中学生组织

上面提到的南俄中学生组织，尽管在履历上没有特别显眼的布尔什维克从其中出身，但是在其成立到并入全俄党的短短两年时间内，仍然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从档案当中能看出来，南俄中学生组织积极参与了地区内的论战与组织工作，在2003年代表大会之后积极的宣传布尔什维克思想与革命马克思主义，与地区内其他路线不明确的学生组织作斗争。该组织与俄国南部11个城市的中学生保持经常联系，散发过《火星报》、《曙光》杂志和马克思、恩格斯以及格·瓦·普列汉诺夫等人的著作。该组织的中央委员会在1902年10月～1903年6月期间印发了约4000份传单。作为俄罗斯工人运动的重要阵地，南俄罗斯在整个布尔什维克的全国布局当中有着相当重要的地位，而中学生组织的工作恰恰为布尔什维克进一步组织南俄工人打下了坚实的知识分子运动与学生工作基础。从《谁发动了十月革命》当中收录的条目可以看出，布尔什维克往往是从中学生时代接触到马克思主义，在被俄罗斯专制政权的压迫性学校教育抛弃后，以15～17岁的年纪进入到工人工作当中，并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如1905年革命和整个反动时期重建组织的工作）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1980年代，秘鲁共产党的实践当中同样相当重视这一部分被学校教育抛弃的中学生。例如，1987年申请公立大学的217679名学生中，有36469人（16.7%）被录取；在申请私立大学的95131名学生中，有28651人（30.2%）被录取。这意味着1987年有247670名申请者未能进入秘鲁大学系统（接近80%）。许多人怨恨缺乏晋升机会；在秘鲁不断恶化的经济中谋求工作同样令人望而生畏。而这些被抛弃的中学生群体中有相当

一部分曾经就读于乡村学校，而乡村学校恰恰是秘鲁共产党培育的革命乡村教师的重要阵地。通过在中学阶段进行初步组织，在“毕业即失业”的阶段正式纳入革命运动中，秘鲁共产党建立了相当有效率的中学生走向革命的传送机制。

当代中国革命当中的中学生。尽管起过一定作用，但是从运动总体和与工人运动的联系来看，这种作用并不积极。中学生组织往往受到外界“左圈”的各类“斗争”影响过多。而且没有摆正位置，要么是左倾复制P大马会，想要在有限的时间与有限的精力的前提下走盲动路线，盲目的到工人中去“整大活”，要么是右倾走向“哲学社”等等理论研究社团，走了一套资产阶级学术路线。”而具有一定规模的“内左联”从兴起到覆灭就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这样的例子，在其中可以发现出大量理论、实践谬误。不幸的是，这样一种偏离马克思主义的谬误并非孤立现象，而是一个广泛的趋势——从2010年到现在，从最普通的团体到最优秀的团体——这是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共同难题。在目前，这尤其对众多马克思主义中学生组织产生了极坏的影响。内左联和先前的S城马克思主义小组一样正好是被思想贫困与实际困难逼迫出来的两条路向，在内左联那里表现为对社会无知、对群众傲慢和盲动主义的东西，在S城的小组那里表现为将马克思主义置于“副业”和兴趣爱好的“岁月静好”态度。这样的现象并不新鲜和孤立，它意味着我们中国马克思主义者还没有能力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把自己组织起来。

我们的经验和定位——中学生可能成为政治化团体吗？

有可能。在这里，我们直接的用其他学校的工作经验，加以匿名化之后进行参考。

在当前的形势下，盲目开展大规模的社会调查并非首要任务，对于新兴的中学生左翼团体而言，当务之急是在理顺内部关系的基础上，建立正式的政治制度，将松散的团体打造成为一个更具团结性和战斗性的政治组织。组织的政治化过程，实质上是克服原子化社会关系、建立严密纪

律与深厚同志情谊的过程，我们需要从安全防线、群众工作、组织制度与内部文化建设四个维度，阐述中学生组织政治化的具体路径。

政治活动的安全性是一个严肃的政治问题，任何成员都必须将其视为首要原则。鉴于地下活动在当前的法律和政治环境中面临的严酷考验，组织必须建立起物理层面与意识层面的双重防线。所有成员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政府机关会主动对潜在的不稳定因素进行资源监视，因此必须严格执行生活与工作分流的原则，即关于组织工作、理论学习特别是涉及国家时政和敏感历史问题的讨论，必须与日常的生活聊天严格区分开来；在公开社交软件上交流时，必须拥有掩人耳目的意识，注意在不同语境下使用代称，或主动规避敏感的政治称谓。同时，为了从硬软件层面规避监视，成员应主动区分“私有软件”与“自由软件”，并在政治活动中使用后者，视安全等级需求购置专门用于通讯的非国产设备，刷入开源的、去中心化的类原生系统，摒弃主流商业软件而使用端到端加密的通讯协议及客户端，并常态化配置网络工具以隐藏流量数据和IP地址，配置安全邮箱作为备用联络点。对于受限于客观条件无法进行线上加密通讯的成员，必须建立替代性的线下单线联系机制，由上线人员与其进行线下对接，采用笔述形式进行每日情况通报，严禁在未通报特殊情况的前提下出现失联或在不安全的通讯层面上进行交流。

在学生侧的工作是组织发展的战略重心，其终极目标是掌控学生社交网络，建立一支在校内具有广泛影响力的政治团体，从而掌握学生运动的主导权。针对目前尚未掌握合法外围组织的现状，我们应保留并优化依靠既有人际关系进行滚雪球式的招募模式。工作路径应分为两个方向：一是在已有的左翼关系网络中，利用文章、书单等资源进行非正式联系和初步筛选；二是主动渗透并掌握本地初高中及职业学校的社交关系网络，包括线上的校园墙、交流群以及线下的同学关系。对潜在发展对象的工作流程必须规范化，即遵循“交流—培训—做工作—吸纳”的路径，在思想灌输过程中，要善于从个人生活困境切入，引导其上升到马克思主义理论高度，最终培养其成为革命知识分子，在此过程中，必须高度关注对象的情感与生活状态，建立紧密的个人联结。

在以上工作的基础上，更应该强调报告制度的地位。报告制既是革命组织的必然产物，也是革命组织的必然要求。列宁已经很好地从实际行动的角度论证了报告制的必要性。他说，之所以要尽可能广泛地打报告，不仅把自己职责内的工作情况，而且把所处的这个工作机构及其成员的情况都报告给上级，是为了让组织能够了解运动的全貌，知道某个成员是不是胜任他现在的职务，知道应当把谁派到什么地方去。革命组织要求思想和行动的统一，而这只有在上下一体，并且下级坚决执行上级的指示、上级也从下级那里得知各种具体情况的时候，才能充分地实现。

与无产阶级革命组织采取的报告制相对，资产阶级的组织采取代议制民主的原则。资产阶级假定每个人可以自由地追求他想要的一切，但却不允许他直接参与政治，而是要求他通过投票选择一个他在政治上的代表。一旦代表被选出来，选民就没有任何办法能够干预代表做出违反他政治意愿的事情，无论是在国家选举中还是在政党内部的选举中都是这样。而在革命组织中，报告制能够防止这一切。每个人通过向上级打报告，都直接地参与进整个组织的政治过程和组织建设中。当小组不得不委托一位同志参加会议或向中央述职时，如果被委托的人想要摆脱组织的“束缚”，用自己的个人见解替换整个小组的观点，那么小组内就可以利用报告制直接进行沟通，坚决地制止这种政客习气。而与此相对应，“只有打了报告和交了联络关系，才能认为参加该小组的党员履行了自己的义务”。

根据报告制，任何小组的任何成员就有权利就政治问题直接提出意见和问题。在这一点上，一个小组的普通成员和负责人并没有什么区别。但与此同时，每个成员也有义务贯彻报告制，而不是乐意的时候就随便写点东西，不乐意的时候就把报告抛在脑后。在后面这种情况下，小组同组织的关系至多只能被称为半自治的，而非所属的关系。如果不把报告制当作一种义务履行，那么革命组织就名存实亡，作为无产阶级意识而行动就永远只是一种美好的愿望。

在此基础上，必须坚决摒弃对公开读书会或合法社团活动的过度依赖。公开活动仅能作为一种掩护性的外围手段，真正的理论武装必须在严密

的秘密地下社团中进行。这种读书会应以单线联系的小组为单位，在安全环境中开展。这不仅仅是单纯的阅读革命理论与思考革命活动，更是一种组织生活。在读书会的内容选择上，必须拒绝碎片化的阅读，转而建立系统的专题知识体系：系统的了解无产阶级和其革命运动的历史、现状、纲领以及目标。要针对当前中学教育中被阉割的历史、政治与经济内容，制定针对性研讨课题，有计划地引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革命史及社会分析理论，用科学的、阶级的世界观填补学生在官方教育下的思想真空。

最后，政治组织不应是冷冰冰的任务分发机器，而应是成员精神与物质生活的共同体。在组织内部，不应有正式成员与外围成员的森严壁垒，所有加入团体的人都应被视为整体的一部分。针对工作中的分歧，应避免非原则性的情绪化争吵，转而采用书面形式清晰阐述策略依据与预期结果，进行理性的辩论。更为重要的是，组织应当承担起人文关怀的责任，密切关注成员的心理健康、情感生活与人际关系。通过非工作性的交流、心理疏导与道德规训，解决成员的实际困惑，使组织成为成员可以寄托精神慰藉的实体。

只有将安全、工作、制度与情感紧密结合，我们才能真正实现中学生组织的政治化，打造出一支无坚不摧的战斗队伍。

二、资本主义保险制度分析

根据运动现状提出组织任务，根据组织任务提出政治任务，政治化的中学生小组才有可能完成列宁的期望，向战斗组织和党小组的预备队靠拢。完成这些任务之后，仍然要极端重视的是组织本身的传承性与连续性的问题。在高考，升学与毕业的压力下，往往很多组织会经历人员流失。但是，如果正确的处理了当前的组织任务与革命总体运动的关系，并且按照这种方式对其成员进行了连续的路线教育与政治训练，一个正式的组织成员就算是离开了他所长期工作的区域，仍然能够在新的区域开辟新的工作。但是，为了维持该地区组织本身的长期存在，仍然需要

一个维持组织存在的在地核心，以保证工作成果能被顺利的传递下去。

中学生革命者要擅长将自己的命运把握在自己手里，将自己的前途融合进革命当中。因此，应该从人生选择的层面上考虑上面提到的问题：是否应该留在自己深耕的地方？亦或者是前往组织需要的地点开辟新的战线？而这就需要学生革命者从革命前途与组织任务的角度思考自己“政治的人生”规划升学，择校以及是否留在本地的问题。

我们从事学生工作的最高目的，是为目前革命的各条战线持续不断的输送优秀的党人：目前我们还没有一个党，是的，所以我们就要让足够的人有能力去寻求建立它。在我们摆脱形式建党（“燎原”大群的建党路线）走向实质建党（社运工运相结合的列宁建党路线）的道路上，需要无数的革命工人小组来填补工人运动留下的空白，而工人小组的出现只能从强而有力的地方组织建设开始培养。

但不管怎样，以上的全部目标，维持联系的可能性与持续深耕的政治工作，只有在我们将组织建立为真正走列宁道路的革命团体、无产阶级先锋队的预备队，在小组成员间建立了有机的革命同志关系的条件下，才有可能实现。因此，问题在于如何组织、如何开端。

最近的一系列事件让我们不断认识到了这两段话的真理性，它是约三年前被写下来的：“要向布尔什维克看齐，致力于建立富有有机关系的革命政治组织，还是要向一般的学生社团学习，仅仅建立一个围绕兴趣爱好和交友轨道运转的空谈家组织”“是要当改进组织生活的实干派，还是要当固守涣散状态的空谈派？”

这样的路线斗争正是最有意义的斗争，才是目前中国马克思主义运动最紧要的斗争之一。现在的我们就在路线抉择的十字路口。

反修　第九期　工革报编辑部

反修